

# 环境启示录书写:生态文学的预警工程

## ——生态批评对环境想像的探讨

胡志红

(四川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 610068)

**摘要:**生态批评既要透过生态中心主义的视野研究生态文学运用环境想象创造生态灾难意象的文学、文化策略,又要研究环境启示录话语构成的主要元素,其目的在于警示人们,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观念主导下的生存范式造成的生态灾难必然遭到自然的加倍报复,进而迫使傲慢的人类充分认识到人类与自然万物同处于一个生命共同体之中,维护和谐的人天关系是延续人类文明的必要前提。环境启示录实际上是一项生态文学预警工程。

**关键词:**生态批评;环境启示录;生态文学;生态灾难;生态预警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09)06-0077-06

生态批评作为一个方兴未艾的文学、文化批评潮流是在日益严峻的现实生态危机的催逼之下,伴随着生态哲学的逐渐成熟而兴起的,迄今为止,它是对生态危机文化根源最为全面、最为深刻文化诊断尝试,其内容庞杂丰富且不断拓展延伸。生态批评对环境启示录书写的话语机制研究是其重要内容之一。本文首先要对西方文化中的几个世界范式大意象(master metaphors)的生态内涵作一简要的透析,以说明自然意象选择的生态结果;其次,本文将通过分析具体的生态文学文本以了解环境启示录书写的内在话语机制;最后,本文还将进一步分析环境启示录构成的主要元素,以便有可能对绿色文化启示录的创作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

### 一 世界范式大意象的建构及其意义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人们为了解自然秩序,建构了多种自然意象,比如,经济体系、生命链、平衡系统、网络、有机体、心灵、机器等。这些意象的影响广泛深入,有的延续了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所以人们将它们看成是历史悠久的世界范式大意象。不借助

于这些意象,我们无从谈论自然,更不可能考虑自然的本质。无论你是否相信它们的正确性,意象的选择会影响甚至决定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对自然的态度、甚至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对不同意象的选择会引起迥然不同的生态结果。

主导现代社会发展模式的笛卡尔—牛顿的机械自然观,是造成当代生态危机的哲学基础,因为它将自然看成是一架无感觉、无精神的机器,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无度的贪欲,不仅疯狂地掠夺征服自然,而且还肆意肢解分割有机完整的大自然。然而,生命之网强调自然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它给人灌输了这样一种理念,万物生灵要么共存共荣,要么同归于尽,这就迫使人类必须谨慎行事,必须认真考量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起的时空效应,因此,生命网的意象客观上有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虽然达尔文自己无意赋予自然目的性,但是,他赞同自然选择的隐喻,这样,他的进化论的观点更易于被维多利亚时期的读者接受。在《华尔登湖》一书中,梭罗极力引入“经济”的隐喻,但是,实际上放弃了传

收稿日期:2009-06-30

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所主持的200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生态批评史”(07XWW00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胡志红(1965—),男,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比较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欧美文学、文化及西方生态批评研究。

统意义上的“经济”。美国环境作家马什(George Marsh)徘徊于家、托管、合作和竞争几个意象之间,试图在两个主体意象之间确立适当的关系。

在过去两个多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建构了两个并列的自然秩序意象,即:网的意象和机器的意象。一般来说,看重世界图景的微妙精致的人喜欢蕴涵机体特征的网络隐喻。达尔文虽然更喜欢作为物种演替史缩影的家系图,但是,在刻画动植物之间遥远的亲缘关系的时候,往往想象它们“被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连接在一起”<sup>[1]3</sup>,因此,一个世纪后,生态文学家卡逊(Rachel Carson),借用达尔文对蚯蚓的研究,将“土壤共同体”看成是由一个交织的生命网络所组成的、每种生命形式都以某种方式与别的形式相连的有机整体<sup>[2]48</sup>。生态诗人贝里(Wendell Berry)指出了肉体与灵魂之间、肉体与其他躯体之间、肉体与世界之间的明显区别,“这些东西似乎有明显差别,然而,它们共存于相互依存和影响的网络中,这就是它们同一性的具体化”<sup>[3]110</sup>。以上这些声明,与机器隐喻的涵义并非截然对立,也可看成是对所建构的宇宙的善意表达,但是,在不同的气氛中也可看成是具有决定论倾向的征兆:动植物毕竟是捆绑在一起的;各种物体与世界共存于一个相互依存的网络之中。卡逊在指出污染的影响的时候,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并协性,她说“生命或死亡网,科学家称之为生态学”<sup>[2]164</sup>。不只是 DDT 在自然生命形式中的无所不在,使得卡逊瞬间将生命转变成死亡,还应该包括此意象的可塑性。

自然秩序大意象的内涵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塑的,当然,其内涵的嬗变往往是由于文化历史的变迁造成的。“存在之大链”本是表示世界仿佛是个井然有序的、由低等和高等形式的存在物组成的大链条,其中,人的地位比野兽高,但比天使低。在中世纪,“存在之大链”在一定程度上是神学对滥用自然的约束。文艺复兴继承了“存在之大链”,但是一种新的思潮,即人文主义,对它予以曲解、篡改,使它从表示完美世界秩序、约束人类行为的象征转变成了人类优于自然的象征。借用“存在之大链”中人的位置在“哑兽”和伶俐的天使之间的安排,人文主义坚持人与生物圈的其他存在之间存在本体论上的差异,并且注入新的内容,即:人有理性话语,然而动物没有。用哈姆雷特的话说:人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这样,人成了现象世界唯一的主体。工业

革命的催逼,“存在之大链”失去了与天堂的联系,人成了自然秩序中“低等生命形式”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这显然是对“存在之大链”的歪曲。

根据《存在之大链》第九章,“存在之大链”曾经为自然存在物提供了稳定等级关系,但是,它依然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它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演替的过程,为 19 世纪的进化论思想铺平道路<sup>[4]</sup>。同时它也为以后生态学的发展铺平道路。例如,生物学食物链概念就是受此启发,来强调自然界生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sup>[5]57</sup>。从某种意义上说,食物链的观念确证了低等生物为高等生物而存在的观念,但是,生态学家颠倒了这个逻辑关系。事实上,是人类依靠细菌,因为细菌支撑草,草喂养牛,牛成了牛排,因此,作为食物链顶部一环的人类与其说很崇高,不如说很脆弱。最简单的生命形式稳定着整个共同体,并对它的延续来说是最重要的。对简单生命形式的破坏将给整个生命系统造成毁灭性的灾难,食物链的意象也进一步打击了盛气凌人的人类。

以上讨论了自然秩序的各种隐喻,以及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文化条件下的生发潜力,尤其是创造性的运用,生态批评就是要运用这些自然秩序的大意象潜力,发挥人的想象力,创造灾难意象,迫使人类接受生态危机迫在眉睫的可怕图景,唤起他们的生态关怀,从而得到预防现实灾难的发生。

## 二 灾难意象的建构:生命网转化成死亡网

卡逊的《寂静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是当代生态文学的经典之作,是它开启了当代环境运动,其问世使得“寂静的春天”顿时变成了“喧闹的夏天”,在美国全社会掀起激烈的论战,其历史意义有人这样评价道,就对公众意识和环境行动的紧迫性的影响来看,《寂静的春天》堪与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识》、斯托的(Harriet Stowe)《汤姆叔叔的小屋》以及辛克莱(Upton Sinclair)《屠场》媲美<sup>[6]104</sup>。那么,为何《寂静的春天》激起如此大的社会反响呢?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卡逊充分发挥其环境想象的能力,建构了无处不在的自然灾难意象之网,使得我们无处逃生,从而催生了我们的环境意识,迫使我们立刻行动。

卡逊在她的头三本书中尽情挥洒其丰富的想象,用散文诗般的语言,将海洋描绘成绿色、精致的完美世界。并预言,“他(人类)已经征服、掠夺陆地,但他不能控制或改变海洋”<sup>[7]15</sup>。然而,很快卡逊终

于意识到她错了,因为“甚至那些似乎属于永远存在的东西不仅受到了威胁,而且已经感觉到了人类毁灭性的手”<sup>[8]181</sup>。《寂静的春天》不是一部以描写为主的作品,依据传统文学观来看,是她最不具有文学性的书。在本书里卡逊无情地揭露了滥用杀虫剂的恶果。但是,她的创造性的想象对此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卡逊的前一本书《在海边》一开始就生动地描写了海边洞穴里面小小迷人的世界,一个只有在退潮时候才能接近的世界。然而,《寂静的春天》却以令人心寒的《明天的寓言》开始,该寓言讲的是一个美国中部的一个乌托邦似的小镇。从前,这里的一切生物与周围的环境生活得很和谐,真有一点“天人合一”的意蕴,但是,现在情况完全变了。动植物都死掉了,人也因为各种怪病走向死亡,“到处是死神的幽灵”,人们曾经年年拥有的鸟语花香的春天沉寂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树林和沼泽”<sup>[2]2</sup>。(卡逊告诉我们这个小镇是虚构的,但是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可以找到许许多多这个小镇的翻版。)虽然没有一个村庄经受过她所描述的所有灾祸,但是,其中每一种灾祸实际上已经在某些地方发生,并且确实有许多村庄已经蒙受了大量的不幸。在人们的忽视中一个可怕的幽灵已经向我们袭过来,这个想象中的悲剧可能很容易地变成我们大家都将知道的活生生的现实。

那么,卡逊是如何运用想象创造生态灾难的意象的呢?也就是说,如何将“生”之意象变成“死”的意象或者如何将生命之网变成死亡之网的呢?首先,寂静的春天激起的恐惧来自突然意识到,不仅净土已经远离我们而去,更糟糕的是,一切都被污染了。在卡逊看来,生命或死亡之网是联系紧密的、甚至是相互转化的<sup>[2]12,164</sup>。如此多的证据驱使卡逊得出生命之网已经蜕变成了死亡之网的结论,因为“水流到任何地方不可能不威胁该地方水的纯洁”<sup>[2]36</sup>,这种情况使得整个自然变得非常可怕。内吸杀虫剂的世界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奇异世界,它超出了格林兄弟的想象力——或许与亚当斯的漫画世界极为相似。它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童话中富于魅力的森林已变成了有毒的森林——这儿昆虫咀嚼一片树叶或吮吸一株植物的津液就注定要死亡;在这里,跳蚤叮咬了狗,就会死去,因为狗的血液已被变为有毒的了;在这里,昆虫会死于它从未触犯过的植物发出来的水汽;在这里,蜜蜂会将有毒的花蜜带回至蜂房

里,结果也必然酿出有毒的蜂蜜来<sup>[2]28</sup>。

在这里,卡逊用她那富于想象的笔触勾画了破坏生态健康带来的灾难,这种灾难是普遍的、跨越边界的,它殃及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无一幸免,这真是世界末日的图景。卡逊将中毒的森林想象成为与文化固有的自然秩序对立的反常现象,在卡逊看来,一个污染的宇宙是如此不合常规,因为作为一个完整有机的世界的自然观已经深深扎根于美国的田园传统之中,是不能挑战的。在写作《寂静的春天》的后期,卡逊知道她患上了晚期癌症,这进一步强化了她对施加在其他人和大地身体上的痛苦的愤怒。卡逊还利用生态学食物链的概念进一步强化化学污染将会威胁所有生命形式的可怕结局:毒物将通过食物链传到了人体内,人也成了自己导演的生物悲剧的直接受害者。在此,卡逊再一次提醒人们,“在自然界没有任何孤立存在的东西”<sup>[2]41,44</sup>,所有生命形式是联系在一起的。

为了进一步强化化学工业造成的恐怖,强化死亡之网的末日感,卡逊运用各种手法,例如,将核战争与污染并置:“与人类核战争所毁灭的可能性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个中心的问题,那就是人类整个环境已由难以置信的潜伏的有害物质所污染,这些有害物质积蓄在植物和动物的组织里,甚至进入到生殖细胞里,以至于破坏或者改变了未来形态的遗传物质”<sup>[2]7</sup>。此外,在《寂静的春天》神秘恐怖的风景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比如,卡逊认为杀虫剂工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sup>[2]12</sup>,某些杀虫剂是源于二战前及期间德国的致命的神经毒气秘密研究计划,而今天,它们打着善意的、正当的幌子,大规模地用于杀“害虫”,最终却杀人类自身,更可怕的是我们很多人对此还不知道。卡逊指出世界范围内癌症病变的上升主要与我们大规模地使用的含有致癌物的化学物质密切相关,人长期暴露于致癌物之中,患癌症并不奇怪,她尤其指出“造血组织恶变的恶性病”<sup>[2]192</sup>的猛增就与长期接触危险化学物质有关,这种病最早是广岛幸存者患的病。卡逊的小说中布满了来自战争灾难的意象:武器、杀戮、屠宰、尸体、灭绝、大屠杀、空中喷洒杀虫剂的飞机以及征服等,凸显她的环境论点:人类在征服自然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甚至走到了人类利益的对立面,危及人类的生存,无可救药。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生产杀人武器的兵工厂现在以另一种

方式杀虫杀人。这一系列的意象,不治之症、死亡等等强化死亡之网的可怕。

《寂静的春天》充分表现了文学生态中心主义的内涵<sup>[9]</sup>,是典型的环境非虚构文学作品,与传统的小说类型有明显的区别。它以刻画、表现非人类世界为其出发点,没有主人公、主要人物、故事情节、人物对话等等。但是,卡逊在去除杀虫剂工业的魔力的时候,也试图赋予它小说式的发展势头,首先考虑地球、水、植物(从第四章到第六章)然后考虑野生物(从第七章到第十一章),最后才考虑人(从第十一章到十四章),以讨论癌症的普遍上升而达到小说的高潮。接着,大自然对人类的反抗(第十五、十六两章论述“害虫”对杀虫剂发起的抵抗),杀虫剂种类的增加,数量的逐年增大不仅没有使我们变得更安全,反而将我们置入更危险的境地。由于打破了生态平衡,“使得整个盛放灾害的潘多拉盒子被打开,盒子中的害虫以前从来没有多到足以引起这么大的麻烦”<sup>[2]221</sup>,最后一章(第十七章)提供可能的解决办法。到此,卡逊已经将我们带到了灾难的边缘,然后,她建议我们走“另外的道路”,然而,这条路也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希望。卡逊也赞成对自然施加控制,只要我们的控制是得当的,她提议采用“生物控制”的办法来解决威胁人类的生存的所谓的“害虫”,但是,她感到非常的绝望<sup>[2]257</sup>。因为卡逊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超越边界、无所不在,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不是基于具体的区域,而必须是立足全球。也许全球性的视野往往使人感到悲观。令人意象不到的是,卡逊提出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很快引起了官方和民间的严重关注,并且着手开始解决此问题。

卡逊凭借其卓越的想象力创造了死亡之网,并不是出于恨,恰恰相反,完全是出于对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生灵之深沉的爱。她将《寂静的春天》献给倡导敬畏生命伦理学的哲学家施韦兹(Albert Schweitzer)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sup>[2]前言</sup>。卡逊的伦理基础是她深信“生命是一个超越了我们理解能力的奇迹”,我们需尊重它,“科学需要的是谦虚”<sup>[2]242-243</sup>,这种施韦兹式的声明要求人类放弃疯狂的统治欲望,理性地对待自然的竞争,保持生态平衡。像任何一种生命形式一样,人类不得不为争取食物、栖息之地、房屋而竞争,有时自然中的各种昆虫也在生存竞争中挑战人类。杀虫剂是人类为了赢得竞争作出的最

新回应,但是,在卡逊看来,人类已经将冲突升级到危险的境地。她试图告诫我们,人类不断增长的主宰和控制自然的能力会与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人类需要谦卑并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寂静的春天》发出了强烈危险的信号,人类的福祉岌岌可危,我们星球上万物生灵的福祉也是如此。在此书中她猛烈抨击人类中心的思想观念,正如她写道“‘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sup>[2]263</sup>,“当人类向着他宣告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他已写下了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这种破坏不仅仅直接危害了人们所居住的大地,而且也危害了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他生命”<sup>[2]273</sup>。

总之,卡逊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运用关于基于自然秩序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的生命之网的意象、食物链的观念,论证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将生命之网转变成死亡之网,创造大灾难、世界末日的意象,震慑被物欲、统治欲驱使的人类,使他们明白,要避免生态灾难,必须放弃人类优越的观念,敬畏生命,与自然万物和平共处。否则,灾难来临之际,将无一幸免。

### 三 环境启示录话语构成的主要元素

启示论可谓历史悠久,《圣经》就有启示录篇章,环境启示论的思维也有几个世纪的历史,生态批评研究的重点不是环境启示论的社会历史演进而是环境启示录话语,也就是它的形成机制及其内涵。

生态文学家创造灾难,恰恰是为了逃脱灾难。期待灾难发生的姿态当然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只有通过想象中堕入地狱”,我们才能有“希望未来逃脱在现实中坠入它的厄运”<sup>[10]295</sup>。生态文学家创造世界末日图景所运用的心理机制类似于弗洛伊德在阐释恶梦时提出的人类具有的伤痛情结。在弗洛伊德看来,恶梦完全是为了产生恐惧,以便更好地应对不测。“这些梦是通过培养我们的忧虑,也就是默认造成精神创伤的一切,恢复控制局面的尝试”<sup>[11]288</sup>。具体来说,恶梦是努力重构糟糕的情形,以便成功地对付它,在这些梦中,丝毫没有逃避的企图,只有积极地面对局面,作出新的努力以便成功地主导形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生态作家凭借想象创造悲剧实际上是为了扭转悲剧,创造死亡实际上是为了新生。卡逊在《明天的寓言》篇中描写的即将正在消失的田园美景,其目的只是创造伦理的对立,

迫使读者正视历史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也就是,人类为中心的文化或自然本身的灭绝已经迫在眉睫。

环境启示录话语通过强化迫在眉睫的毁灭的主题,足以维持高水平的环境激愤。《寂静的春天》出版了30多年,其传递的环境信息“魅力”不但不减,而且与日俱增,充分说明了其作为环境启示录经典的成功。在此,笔者主要根据美国生态批评学者布伊尔(Lawrence Buell)的分析对环境启示录的五个基本要素作一简要的疏理<sup>[10]302-306</sup>。

第一,突出网络化的关系,这是环境启示录最重要、也是最明显的特征。它要求运用网络及其同义词的隐喻来理解和勾画环境现实。杀虫剂使卡逊感到最恐惧的是它通过食物链、水循环、大气循环的扩散。在这些领域谈论生物的相互依存完全是冷静客观分析,并不含有任何政治和感情成分。当然,以生物共同体、生态系统等概念来整合各种现象很适合卡逊这样作家的灾难预警的目的,因为他们理解这种话语及其蕴涵的各种征兆。利奥波德也利用网络的隐喻要求保持生态平衡的,否则就会造成生态失衡,而导致灾难性的恶果。人与自然万物同处于一个由“土壤、水、动植物以及人类”共同构成的生物共同体之中,生物共同体是个相互联系的网络,人类的利益必须与共同体各成员之间的利益协调。<sup>[9]303</sup>

第二,环境灾难启示视野强调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倡导生态中心主义的平等。像梭罗将动物想象成邻居,像缪尔或传统的美国土著人将各种生命形式想象成植物人、太阳青年、祖母蜘蛛等等,像利奥波德将人看成共同体中普通的公民,或像辛格(Peter Singer)一样将所有动物看成是平等的、反对物种歧视,那么杀死一只苍蝇应该像杀死一个人一样有罪。赋予非人类世界属人身份的神话最强烈地凸显了生态中心主义平等的观念,西方生态学家重新将地球想象成盖亚,人与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是对等的,各种生命形式具有共同的根,这样大量的非人类生物的灭绝使人感觉到像个大屠杀。卡逊认为对动物的残酷是失去做人的尊严,于是卡逊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任何文明是否能够对生命发动一场无情的战争而不毁掉自己,同时也不失却文明应有尊严”<sup>[2]86</sup>,其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她看来,任何默认为生命采取残暴行为的人将失去做人的身份。

第三以及第四种因素是放大和并置,也就是说,

转变视觉结构,放大事物的规模,跨越时空将事物并置。《华尔登湖》就是典型地运用了这两种技巧,使得每时每刻,或常常感觉到如此,都变成了最重要的时刻;每个物体都得到了深化;无论多小的事物都不感到小。

第五个因素是迫在眉睫的环境灾难意识。以上四种认识方式,即:相互联系,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放大和并置等,都是服务于环境启示的目的,然而没有第五种因素,它们不会服务于共同目的。也就是说,没有第五种因素即环境灾难意识不能构成环境启示录对话。梭罗就没有强烈的、迫在眉睫的生态灾难感,虽然面对波士顿周围大片森林迅速消失,他深感痛惜,并且对威胁、玷污华尔登湖圣洁的伐木者、铁路以及他自己予以谴责,但梭罗对大自然抗拒人类的能力仍然充满信心<sup>[12]245-248</sup>,所以,在梭罗的文中生态灾难感没有那么强烈和紧迫,他甚至认为“部分耕种的乡村”优于荒野,“荒野是人类文明的原料”<sup>[13]153-55</sup>。直到马什的《人类与自然》的问世,英语世界第一部系统地分析即将发生的环境灾难成因的环境作品才算出现,马什也因此成了第一个美国环境灾难的先知,他传达了一种迫在眉睫、振聋发聩的灾难信号:“地球正变得不适合为其高贵居民的家园”、人类的贪婪与鲁莽会“将地球沦为贫瘠的蛮荒之地,甚至导致各种物种(包括人类)的消亡”<sup>[14]43</sup>。他还特意警告患增长癖的美国人不要忽视前人无视自然限制而获得的痛苦教训,否则美国将会重蹈其他文明因人为破坏环境而导致衰亡的覆辙。

20世纪后期环境反乌托邦主义的存在有其重要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对自然的过度掠夺或过度的人为干预导致自然不可扭转的环境退化;受蹂躏的自然以压迫者的身份反击人类;人类没有出路。环境启示论不仅仅是西方人的无所不在的噩梦,也是全人类的噩梦。生态批评透过生态中心主义的视野研究生态文学运用环境想象创造生态灾难意象及想象世界末日恐怖图景的文学、文化策略,其根本目的在于警示人们: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观念主导下的生存范式对自然犯下的种种罪行必然遭到自然的加倍报复,最终要遭到彻底清算,以此震慑傲慢的人类,迫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人类与自然万物同处于一个生命共同体之中,维护和谐的人天关系与人类自身的利益是一致的,人类要创制辉煌的文明,

充分实现自己的价值,必须站在人与自然共同命运的高度考量自己的行为。由此可知,环境启示录是通过想象环境灾难唤醒人的生态良知,进而对生态

灾难进行预警。生态文学家想象灾难,恰恰是为了逃脱灾难,想象末日是憧憬未来,想象死亡是为了新生,为了拯救。

#### 参考文献:

- [1] Charles Darwi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A Facsimile of the First Edition*. Ernst Mayr: HUP, 1964.
- [2] 雷切尔·卡逊. 静静的春天[M]. 吕瑞兰,李长生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 [3] Wendell Berry. "The Body and the Earth." *The Unsettling of America*.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1977.
- [4] Arthur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 [5] Roderick F. Nash, *The Rights of Nature: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6.
- [6] Lisa H. Newton, and Catherine K. Dillingham. *Watersheds 3: Ten Cases in Environmental Ethics*. Belmont, CA: Wadsworth, 2002.
- [7] Rachel Carson. *The Sea around U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8] H. Patricia Hynes. *The Recurring Silent Spring*. New York: Pergamon, 1989.
- [9] 胡志红. 文学生态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挑战[J]. 四川大学学报, 2006, (3): 96-97.
- [10] Lawrence Buell.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1] David Lodge, ed. *20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72.
- [12] Henry David Thoreau. *Walden in Walden and Other Writings by Henry David Thoreau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Ed. Joseph Wood Krutch. 3rd ed.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2.
- [13] Henry Thoreau. *The Maine Woods*. Ed. Joseph J. Moldenhauer. Princeton: Princeton Press, 1972.
- [14] George Perkins Marsh. *Man and Natur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3.

## Environmental Apocalyptic Writing: Preventing Project of Ecoliterature

HU Zhi-hong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Ecocriticism studies in an ecocentric perspective the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rategies of ecoliterature use of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o create ecocatastrophe images as well as the main elements of environmental apocalyptic writing, so as to warn people that all man-made ecocatastrophes in the anthropocentric existence will inevitably incur revenge form nature that will force the arrogant human beings to fully realize that both humans and natural entities live in the same biotic community,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harmonious 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the precondition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Environmental apocalyptic writing is in fact a preventive project of ecoliterature.

**Key words:** ecocriticism; environmental apocalypticism; ecoliterature; ecocatastrophe; ecoprevention

[责任编辑:唐 普]